

读者参考

丛书

59

你快乐吗？

◎中国经济走过拐点 ◎中国最需要心理自助

◎中国人不能永远这么便宜

◎太平洋：美军的下一个战区

◎“学而优”后应该做什么？ ◎一场足球盛宴后的感悟

DU
ZHE
CAN
KAO
CONG
SHU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快乐吗? /《读者参考丛书》编辑部编.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10

(读者参考丛书:59/林雨主编)

ISBN 7-80668-814-5

I.你... II.读... III.文摘—中国 IV.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1335 号

本书资料除编者据各种资料汇编而成的文字以外,所用图文资料均标明出处及作者。转录图文均酌付稿酬。有未及奉达者,请即与我编辑部联系。

你快乐吗?

读者参考丛书(59)		2004 年 10 月出版
编辑:《读者参考丛书》编辑部		执行主编:林 雨
责任编辑:天 水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版:学林出版社	地址: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邮政编码:200235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邮购:学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地址:上海文庙路 120 号		邮政编码:200010
印刷: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印张:8	字数:28 万
ISBN 7-80668-814-5/Z·34		定价:10.00 元

读者参考丛书

(59)

你快乐吗?

目录

当前社会信仰危机的深层原因	1
“有限政府”呼唤三大“托架”	3
审计风暴与变革静悄悄	9
中欧关系路线图	17
亚洲经济走在危机边缘	21
中国经济走过拐点	23
“涨价”的代价谁来付	27
上海的产业迷局	30
五十年后,企业界谁当大	34
韦尔奇的“百万”箴言	40
一位农民的秘密调查报告	46
“牛群模式”提示:	
县域经济亟待走出浮夸陷阱	165
大学生求职的九种不健康心理	81
插柳不叫春知道	
——邓小平“南巡”中鲜为人知的故事	48
项怀诚这十年	56
逝者杨小凯	63
单亲时髦挑战美国婚姻传统	71
离婚后男人比女人更痛苦	94

改变人生的一句话	76
生活闲适的人	80
生活是可以这样拐弯的	82
每天都度假	85
我还有一个苹果	62
重要的是心境	115
 成功智力理论:职业教育发展的新观点 ...	28
高学历人才过剩堪忧	83
“学而优”后应该做什么	87
警惕中学生心智幼稚化	89
新课程与“猫论”	145
中国的考试与美国的考试	88
谁最容易知识失业	124
“神童”父亲教子秘诀	121
 生活的精彩让我无从回避	91
我们活着的可能性有多少	
——史铁生与复旦大学学生的对谈	95
凌志军:大声音必定诚实	102
池莉:一条宁静的河	109
毕淑敏:中国最需要心理自助	114
你快乐吗?	116
 “以人为本”之本	122

在历史线索中确定城市的定位

——张开济访谈录····· 125

中国建筑应该有更多精神性的东西 ····· 131

兄弟文化：干并痛快着 ····· 136

低代价经济增长论备受关注 ····· 139

关于党史人物研究 ····· 141

像姚明那样打比方 ····· 146

三人行：甲 A 十年 ····· 133

一场足球盛宴后的感悟

——欧锦赛断想六则 ····· 149

龚建平死了 公正必须活着 ····· 152

宪法：有形的制度，无形的文化 ····· 154

应建立宪法诉讼制度 ····· 158

不要人为抬升良知的成本 ····· 42

城市的败笔 ····· 69

奢华消费凸现浮躁心态 ····· 74

中国人不能永远这么便宜 ····· 160

为何“不合时宜”那么难 ····· 162

可不可以悄悄地开会 ····· 164

“二政府” ····· 166

郭世英之死的尘封谜案	170
父女殊途:陈布雷和陈琏	173
帕斯捷尔纳克事件真相	180
鲜为人知的院士故事	183
高原暗战	
——CIA 支持藏独分子始末	188
人类能移居火星吗	161
外星人到底在哪里	153
假如没有台风和闪电	196
太平洋:美军的下一个战区	200
心理战:战斗力的重要生长点	202
我军对外交流日渐活跃	167
北京交通:无知者之痛	197
古长安城有个骡马市	205
乐观的忧虑	
——国际社会对中国宏观经济的	
复杂心态	207
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53
中日关系的现状及发展前景	211
给美国市长当助理	215
香港回归七周年省思	219

两岸互动中的台商	222
理性看两岸	39
 鸭绿江的另一边	225
德意志性格	230
慈善英雄榜	155
欧洲人的排队风格	235
 我国社保改革面临四项挑战	151
中国城市公众自认“下层”者多	238
注意中国的后发劣势	159
还有多少事等着批示	20
医疗费：生命难以承受之重	239
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观察	241
我国国企工资水平与市场价位脱节	218
中国民企 500 强排名揭晓	249
 有些病其实不用治	245
英年早逝 祸起“慢疫”	242
流行保健法或许更伤身	194
必须警惕七类病兆	148
如果“1”倒了	248
生什么病吃什么水果	179
老人久看电视易患青光眼	237
孩子吃得过饱不利大脑发育	199

我国饮食史上的四大发明	22
自然资源的分类	240
国 鸟	90
我国的省鸟	186
语丝	16,26,70,79
.....	101,108,210

封面图片 心有千千结

摄影:简庆福 选自林路《摄影艺术二十
讲》,学林出版社

NI KUAI
LE MA

MULU
DUZHECAN

KAOCONGSU(59)

当前社会信仰危机的深层原因

□程恩富

有人说,现在高校师生和党内外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信仰与 50 年代的人相比有较大的减弱趋势;也有人说,信仰的减弱是理论宣传不够所致。而我以为,这种现象的发生,不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宣传和学得太少,亦不是基层教育宣传者的个人水平太差,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理论关节点、所有制、社会生活、宣教效果、学科方向、党章和教材内容等方面存在缺陷。

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比较来分析,由于在祖国内地与港台、北朝鲜与南朝鲜、东德与西德、苏联与美日等一些经济比较中存在方法和信息上的问题,因而误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进而怀疑马克思主义。事实上,这些尖端的难题都是可以得到圆满的实证分析和理论解释,从而证明改革前后的社会主义制度均优于资本主义制度,但这类研究成果没有被学术界和官方广泛接受,进而形成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障碍。

就苏联解体的原因来说,党内外和学术界没有形成科学的主导思想。尽管江泽民同志在过去的讲话中曾指出,苏东国家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放弃社会主义

的失败;但由于中央没有一个正式文件或一篇文章对此作过系统分析,因而众说纷纭,思想混乱。我赞成中国社科院陈奎元院长在今年 4 月 20 日《人民日报》的文章所下的结论:“苏共丧权、苏联解体,当然有体制僵化、经济缺少活力、决策失误等多方面的原因,但精神信仰的崩溃,在‘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冲击下,党和人民的思想陷于混乱,则是更为深刻的根源。”

从存在决定意识,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分析,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大卖或大送国有企业,而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再过几年,将达到一半的比例,这自然容易使越来越多的人怀疑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性,认为我国即将进入公私对半的“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的社会,进而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长期存在的必要性产生怀疑。

有些善良的同志,以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所有制结构的本质规定性,以为意识形态同经济基础没有密切的决定性关联,以为共产党可以长期领导一个以私有制占多数的国家,用这种缺乏历史唯物主义常识的模糊理念去从事改革、宣传和教育,势必会加深社会信

仰危机的程度。

从理论宣传教育的结果来分析,有相当多的人得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不姓资、不姓社,只要‘三个有利于’,而邓小平在‘三个有利于’前面加的‘社会主义’仅仅是说说而已”,得出“只要共同富裕,而不管实行什么‘主义’”,得出“邓小平事实上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甚至得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同社会党的理论没有本质区别”,他们进而怀疑党的性质,怀疑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怀疑马克思主义。

这就提醒我们应该反思:为什么占用这么多的资源,花费这么多的精力,作了这么长时间的宣传教育,竟然还有日渐增多的重要人士和社会公众形成了截然相反的思想结论。类似的状况并非罕见。其缘由,除了上述所有制结构变动的因素影响之外,与理论宣传教育上的逻辑矛盾性、片面性和空泛性,也有直接的关系。这就提示有关高层部门,必须集思广益、与时俱进地重新审视某些现存理论,重新探究宣传教育的针对性、策略性和有效性。

从课程和教师的比例来分析,少量的公共理论课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思想和主张,而又有不少社会科学的专业课或多或少地作了反宣传。譬如,有些学者在西方学了西方经济学等专业,回国后没有继续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课程,而当时使

用的西方经济学等教材又是原版的,这样,他们在给学生上课时,便自觉或不自觉地作了反教育。这个问题极为普遍。可见,使用和重用自然科学人才同使用和重用社会科学人才,是有不同特点的。如果执政党不掌握这一人才的发展规律,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中将有可能自乱阵脚,适得其反。

从党章和文科教材来分析,党章和现用教材中都没有关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的定义及其基本特征的阐述。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教材还有关于共产主义基本特征的简短论述,后来几乎将其全部删去,仅仅孤立地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导致日益增多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认为共产主义的经济制度特征和本质规定是讲不清楚的。如果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共同所有制和按需分配都不算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特征和本质规定,而只是追求在物质财富、思想精神和人的发展三个方面的极大提高,这是不是用抽象特征来取代基本特征?脱离马克思文本所规定的经济制度本质特征而单纯谈论这三个抽象特征,又怎么使人清晰地得知将为此奋斗一生的共产主义目标的确切内容呢?事实上,在马克思原创学说里,关于共产主义的三个抽象特征是以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共同所有制和按需分配等基本特征为基础来统一描绘的。

(摘自《社会科学报》)

“有限政府”呼唤三大“托架”

□应笑我

要建立有限政府，就要防止“泛行政化”和“泛政治化”；同时积极发展现代社会自治组织，为现代国家提供公民社会支柱。

七年立法 十年目标

将于今年7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将是世界上以单行法形式颁布的第一部行政许可法。当然，这并不是说其他国家不重视行政许可法，但中国社会对这一法律所寄之厚望，自不待言。

这部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各级官员高度重视的法律，形成过程长达七年。而对温家宝总理来说，这一部法律也是实现其“十年内中国建成可问责法治政府”伟大目标的加速器和发动机。

今年1月，在“全国贯彻《行政许可法》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开门见山地说：“新年之初，国务院就召开这样一个会，请各省的省长、各部的部长参加，足见这次会议的重要。为什么贯彻一个法要召开这么高规格的会？因为《行政许可法》是一部规范我们各级政府行为的重要法律，各级政府和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好贯彻实施工作。”

其实，温家宝总理去年9月23日曾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此法。9月底，国务院下发《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通知》。10月下旬，国务院法制办召开全国政府法制部门会议，具体研究贯彻实施问题。11月初，国务院举办《行政许可法》专题讲座。12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又下发《关于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的工作安排意见》。可谓紧锣密鼓。

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以来，《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相继制定实施，中国建设法治政府进程已经启动。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通过《行政许可法》并启动《行政程序法》起草工作，不仅是这一进程向纵深发展的标志，也恰逢新一届政府强调“十年建成可问责的法治政府”之机。

法治政府第一要义是保障公民自由、限制政府权力、建设“有限政府”。因此，《行政许可法》开宗明义限制政府规制人们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范围。

法治政府只能是统一的政府。因此,《行政许可法》取消中央政府部门许可设定权,对地方政府许可设定权亦加以严格限制。

法治政府必须奉行公开原则,防止腐败滥权,坚持透明廉洁。因此,《行政许可法》确立许可实施公开原则和相应制约机制。

法治政府必然要体现公正、公平、诚信。因此,《行政许可法》以规范许可程序作为立法重要目标。

法治政府理所当然是便民政府、高效政府。因此,《行政许可法》将便民、高效规定为行政许可行为的基本原则,并确立一系列相应规则和制度。

正如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汪永清所说,把握住了行政审批制度、行政许可制度,就抓住了我们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根本。“现在连当保姆也要审批。我们就要思考一下,当律师要审批,当保姆要不要审批?不要批的理由何在?我们认为,当保姆不需要审批,因为公民法人,也就是老百姓自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现行的行政审批当中,近50%是要改的,量相当大!”

目前,全国正全力宣传《行政许可法》对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历史性意义。然而,任何一部具有纲领性意义的法律要想不只停留在纸上,还必须具备实践的“托架”。在中国法治政府十年远征开始之际,我们需要认真考虑之。

基本的“托架”： 现代化的公务员队伍

在新世纪的中国各大城市中,竞争最为激烈的就是香港和上海。但是,就争夺国际大都市和亚太地区金融中心这一点来说,上海需要知道何为对手的强项。

这就是香港有一支成熟、稳健、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

2001年春,原香港特别行政区一位高层官员在一次演说中说:“我想问问市民,香港特区有哪些可贵的信念,是他们希望捍卫和保留的。我想请他们仔细思量,相比于区内的竞争对手,包括上海等内地城市,香港的优势究竟为何。今天,我打算通过自问自答,说出心中的信念。”

她强调的信念核心就是香港的科层制公务员,“我们崇尚法治精神,享有司法独立,政府廉洁负责,并由秉正无私的公职人员施政。我们的公务员队伍任人唯才,坚守中立信条。在这个全球一体化、通讯发达、瞬息万变的年代,我的论调听来不免像老生常谈,但这些制度是香港繁荣安定的基石,无论潮流风尚如何转型改变,这些制度都必须维持不变。”

新世纪元年元月,在香港举行的“世界一流公务员锦囊会议”,英国历史学家亨尼西教授提出优秀公务员的标准:以任人唯贤为聘用原则,使受聘者以此为终身事业,在任

何情况下均可落实实事求是作风，并以向上司直言进谏为首要职责。与此同时，恪守专业道德，坚持以公平而透明的方法筹措公帑，并以廉洁无私的态度，严谨地把公帑用于由立法机关核准的用途上。

“向上司直言进谏是什么意思呢？”这位官员指出：“我认为这是指掌握最真确的资料，进行客观分析，并据此向上司提出恰当意见，即使是逆耳之言，仍直言不讳。我和同事们自入职以来，一直被培训和鼓励为忠言直谏的公务员，而这种作风，也促使上司、下属及同辈之间建立互信。这种密切合作的处事方式，使官员之间的关系建基于互信，而非取决于个人或政治即兴的考虑，同时亦为公务人员提供充分的个人保障。”

这一席话很有说服力。我们知道，所谓政府是由公务员组成的。倘若没有奉公守法、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何来好的政府？

现在国内有个共识：中国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定位，就是实现行政组织体制的理性官僚化。官僚制，又称科层制，在管理学中，它是中性词，并非“官僚主义”作风的同义语。建立在法理权威基础上的理性官僚制，在现代行政组织中得到了充分运用。

这种模式中，由法规严格规定机构与人员的职责权限；严格的公私分开使公务关系对事不对人；官员须通过职业化考核，并只向职务

目标效忠；官员由上级权力当局任命而非选举产生；官员身份终身制但没有占有职位的权利；官员接受定额薪金及养老保障，升迁依据个人资历或成就。

这种制度“举起理性和逻辑旗帜，批判和否定了产业革命初期靠个人专制、裙带关系、暴力威胁、主观武断和感情用事进行管理的做法”。保障了人人在法规、制度面前的形式上的平等和非个人性，其基础是专业知识、专家职业，以及广泛的社会招募来源。

历史地看，官僚制理论的运用，促进政府由“人治”到法治、由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的历史性转变，标志着现代行政的开始。如文官制度的实施，结束了在美国实行的五十多年的“政党分赃制”，基本上杜绝了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权力腐败现象，为实现高效廉洁的行政创造了条件。

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后，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期间，先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分层管理的“世袭官僚体制”和科举官僚制，并发展出严密的组织机构和治理制度，这本身的确包含理性化成分。但其本质不是量化的专业技术考核，而是“引礼入法、礼法结合”的伦理判断，行政机构粗糙和技术落后，使之在形态上只能是“人治”，不仅未能培育出现代技术理性精神，反而遗留下来令人痛恨的“官僚主义”。

中国当代行政组织理性官僚化过程,要借鉴官僚制的理性精神,使我国行政组织尽快走向规范化和法制化。尤为重要的是应尽快制订“千呼万唤未出来”的《公务员法》,把行政官员的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制定政府及其部门机构与人员编制法、行政程序法,控制机构膨胀与管理中的主观随意性;完善政务公开、群众投诉和各种对行政的监督措施,进一步健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等各种责任追究机制,确保对行政权力运作的有效制约。我们期望有一天,中国内地能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公务人员,使“优秀公务员”成为与“劳动模范”、“新长征突击手”、“模范党员”等同样得到全社会尊敬的光荣称号。

核心的托架:

确立科学的党政关系

理性和高效的官僚制,必须要有相应的政治体制作为保障,特别是政治与行政的相对分离、完备的法律体系、专业性的管理者集团等。由国情民意和现代革命传统决定,中国不可能实行“三权分立”、多党政治、政治中立等职业文官体系,但必须保证行政权力的独立性和受制约性。当前最突出的任务就是理顺党政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各级人大的权力,保证司法的公正性和独立性。

按韦伯和黄仁宇的说法,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是把一切社会技术

问题泛伦理化的社会,而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列强鲸吞蚕食,面临危亡的中国开始把一切社会技术问题泛革命化、泛政治化。这在“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改革开放二十多年,随着社会运行高度规范化、复杂化,我们的生活逐步理性化。“仁义礼智信”也好,“以阶级斗争为纲”也好,都不适应哪怕一个居委会辖区的日常工作。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几代领导人都旗帜鲜明地强调“党要管党”这一重大原则。在这条事关中国稳定、发展根本大局的原则上,怎么走出切实可行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问题。

在政府拥有无限的行政权力、缺乏立法权力的有效制约的同时,我们看到,以一般公共服务为内容的中国行政权力,也受到政治权力的过多制约。这主要表现为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只有理顺这个关系,中国现代行政管理制度建设才有了核心“托架”。

不久前,中纪委对原河北省省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的审查和处分决定中说,“程维高在担任河北省主要领导期间,插手行政事务,为他人和其子程慕阳谋利,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放任配偶及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违纪甚至违法犯罪活动;利用职权,对如实举报其问题的郭光允同志进行打击报复……”

“插手行政事务”,这句话隐含

着一个重大问题。程作为省委书记可以干预行政事务吗？按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不可以的。党章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地方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按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发挥核心领导作用。

当然，按规定，地方党委对地方重大行政事项拥有决策建议权。但正像一些学者强调的那样，行政事项与行政事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党委管大方向、大事，不应插手具体事务；而且即使有关键或典型意义的“事务”，确实需要采取干预行动的是党组织，而绝不是党委书记个人。然而，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当代中国的公共行政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领导方式的改进非常重要。在“党政分离”问题上，我们声称的一贯政策是，实施政治和组织上的领导，通过国家机关党组织的作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不包办政府机关的具体业务。《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共产党当然也不例外。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过程中还有一个巨大历史任务，即防止任何特殊利益集团凌驾社会之上。目前，据统计中国有4500万中央及地方官员、440万国有银行及大型国有企业官员、700万“事业单位”人员，他们的

利益还并不完全等同于全民的利益。整个社会应有此常识。

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特别前苏联东欧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国家现代化转型期，本应成为公民社会中坚的科层官僚并不一定自动转型。在我国，对那些至今仍然由武装警察充当警卫的铁路、民航、电力等部门，尤其如此。因此，胡鞍钢等专家提出，目前中国改革的难点与重中之重，就是如何处理这些具有行政垄断地位的特殊利益集团。关键是使之从经济人与政治人的双重身份变为纯粹的经济人，而不是政治家或行政长官。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对此责无旁贷。

最后的“托架”： 成熟的公民社会组织

“美国人遇事急着找律师，中国人遇事急着找表姨。”

在中国，闹市街头，两车相撞，如果两个当事人竞相打电话，一般情况下是一个人找警察，一个人找“关系”。其他如交通违章车辆被扣，忙碌打电话的更是在向亲友“求救”。

6月初，北京一著名律师向社会宣布，自7月1日《行政许可法》实施之日起，将承揽各种对政府部门的相关行政诉讼。他说，由于行政背后的利益因素，一些拥有许可权力的部门并不甘心依法放弃权力，有的部门可能以种种借口拖延

甚至抵制应予取缔的许可行为,因此他呼吁法律工作者尤其是律师,承担起职责。

我们也希望,从律师协会到注册会计师协会,从消费者保护组织到个体商业者组织,都能自觉行动起来,更多、更主动地以法律武器而不是人情关系来捍卫自身及社会的利益。

在政府不受限制的地方,只有臣民、草民,而没有公民。而中国要迈入公民社会,特别重要的是公民社会的自我管理制度。培育上述行业协会等社会“第三部门”就格外重要了。

“第三部门”,主要指在政府部门和以赢利为目的的市场部门之外的“非赢利部门”,它与政府部门、市场部门共同构成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政府的职责是“以强制求公益”,市场则是“以志愿求私益”,而第三部门则被定位为“以志愿求公益”。它是自由公民的联合体。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性的社团革命”悄然兴起,背景是现代福利国家危机和全球性环境危机,引起人们对“帮助人们自助”和“参与式发展”的关注。鉴于从东方到西方都存在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人们认识到政府做不了、干不好的事和市场不愿做、做不了的事,第三部门是一个理性选择。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拉蒙教授通过对41个国家的比较研究,认为“全球性社团革命”对20世纪晚期的意义,如同19

世纪晚期民族国家的兴起。

只有社会组织成长壮大起来了,政府才可能真正尽可能多地退出民众的日常生活。可是,目前中国每万人拥有的社团数量为1.45家,这一比例同埃及比较接近,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社团总量不足,大大制约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也制约了中国社会管理现代化进程。

1953年,第三帝国崛起20周年之际,在一项关于德国历史上哪个时期最好的民意测验中,当时的联邦德国有45%的人选择1914年前的德意志第二帝国,42%的人选择纳粹的第三帝国,而只有7%的人选择民主共和的魏玛共和国,2%的人选择新的联邦共和国。而到了1972年,支持和认同民主政治的人则达到了9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应当注意到,联邦德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公民社团协会最多的国家。

其实,战后日本与德国的最大不同,不仅在于是否为战祸道歉,更在于德国公民社会前所未有地成熟壮大,这使自大、夸张的普鲁士军国专制主义再无立足之地。

我们中国人在从“全能政府”向“法治政府”的远征中,会越来越深刻地领会到“第三部门”的重大价值!

(摘自《南风窗》)

审计风暴与变革静悄悄

□孙立平

政府行为的企业化是导致权力腐化和集体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次审计报告揭露出来的几个大的案例来看,这种腐败已经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

每年国家审计署都要向人大常委会提交审计报告,但是,人们发现,问题似乎没有解决,而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人们呼吁,在审计风暴之后还应当有一场问责风暴。

“你来我往”的另一种含义

6月23日,似乎很寻常的一个日子。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做审计报告,内容一经报道旋即引起举国关注,人们所称的“审计风暴”由此而始。

报告指出,在审计长江堤防隐蔽工程建设情况时发现,部分施工单位买通建设和监理单位,采取各种手段弄虚作假、偷工减料,工程质量令人担忧。豆腐渣工程再现长江堤防。

这是李金华在审计报告中披露的一系列大案要案之一。

李金华说,长江堤防隐蔽工程存在水下护岸抛石少抛多计、水上护坡块石以薄充厚等问题。抽查5个标段发现,虚报水下抛石量16.54万立方米,占监理确认抛石量的20.4%,由此多结工程款1000多万

元,目前部分堤段的枯水平台已经坍塌;抽查11个重点险段发现,水上块石护坡工程不合格的标段达50%以上。在这一工程建设管理中,有关责任人以权谋私、大肆受贿。此案上报国务院后,有关部门立案查处,目前已逮捕21人。

6月25日。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重要堤防隐蔽工程建设管理局办公室工作人员李进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电话采访时,对审计报告中的上述内容做出回应,他称:审计部门是受请开展长江堤防隐蔽工程相关审计的;审计报告披露的问题是隐蔽工程局在工程竣工验收前自查出来的;披露隐蔽工程质量问题是审计部门为了“表功”。

6月30日。

国家审计署发表《关于媒体报道长江堤防审计情况的说明》,说明中指出,李进的上述言论,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是不负责任的,经新闻